

国际关系

## 外围国家的自主性模式： 拉美“自主性学派”的视角\*

陈 岚

**内容提要：**在“中心—外围”的国际体系结构中，位于体系中心的强国是国际规则的制定者，掌握国际事务的主动权，而位于外围地带的弱国则是国际规则的接受者，外交行为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因此，自主性成为外围国家对外政策中的核心概念。外围国家如何才能加强自主性？拉美国际关系学者围绕“自主性”这个命题，形成了强大的地区学术共同体，提出了“对抗型自主性”“外围自主性”“非正统自主性”“投资型自主性”和“关系型自主性”这五种迥异的“自主性”观，阐述了外围国家谋求国际事务自主性的路径。“对抗型自主性”主张革命；“外围自主性”主张消极中立；“非正统自主性”主张在战略问题上与中心国家保持一致，但抓住稀缺的机会开展战略性操纵；“投资型自主性”主张以自主性为工具，追随中心国家，以便获取中心国家给予的援助或地位；“关系型自主性”则主张利用全球化带来的相互依赖网络，相互牵制，便能获得更大自主空间。本文梳理拉美“自主性学派”提出的外围国家谋求自主性的行为模式，试图建立起外围国家对外政策的初步分析框架。

**关键词：**外围国家 自主性学派 依附理论 外围现实主义 关系型自主性

**作者简介：**陈岚，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浙江外国语学院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讲师。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649(2019)05-0116-16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拉丁美洲解放神学研究”（编号：160CZJ015）以及浙江省教育厅课题“中国对拉美投资合作中的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研究”（编号：Y201534351）的阶段性成果。

亚历山大·乔治和罗伯特·基欧汉提出国家有三大利益，即自主性、生存与经济福利，这三大国家利益可以被非正式地理解为自由、生命和财产。<sup>①</sup>温特进一步指出这三大利益不仅是国家行为的规范性指南和最终目的，也是国家行为的因果机制。<sup>②</sup>在这三大国家利益中，自主性指国家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具有能够按照特有的国家逻辑行事的能力。自主性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作为国内政治概念，对国家自主性的分析主要考察国家与国内社会结构的关系；二是作为国际政治概念，对国家自主性的分析主要考察国家相对于世界的相对独立自主程度。从本质上说，推动国家成为国际体系中施事者的驱动力外在地表现为权力、利益与荣誉等目标，但真正的内在因素却是国家对自主性的追求，即国家自主性是国家追求的根本目标，当然亦是最根本的外交目标。<sup>③</sup>

在考察作为国际政治概念的“自主性”时，很明显可以发现，国家“自主性”与国家自身能力紧密相关，也与其所处的国际互动结构相关。因此，各国享有的“自主性”程度差异显而易见。在结构现实主义者看来，“自主性”是强国的资源，尤其是霸权国的资源。华尔兹明确提出，权力可以用来维持强国的自主性，并赋予其为实现自身利益而采取行动的能力；与弱国相比，强国享有更大的安全余地，并对于进行何种博弈游戏以及如何进行更具有发言权。<sup>④</sup>在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下，强国通常通过构建国际体系来增加自己在国际体系中主动决策的能力。因此，国家自主性的一般演进逻辑是从权力主导型到制度主导型，再到观念主导型。<sup>⑤</sup>而国际体系中的外围国家显然没有在国际体系中从事权力主导、制度主导和观念主导的意愿和能力。国际体系对外围国家的自主性具有制约性的负面效应。那么，外围国家如何看待自主性这个概念？外围国家怎样才能增加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自主性？

研究外围国家的自主性，拉美国家是最好的案例，因为拉美国家最早被

<sup>①</sup> Alexander L. George and Robert Keohane, "The Concept of National Interest: Uses and Limitations", in Alexander L. George (ed.), *Presidential Decision Making in Foreign Policy: The Effective Use of Information and Advice*, Boulder: Westview, 1980, pp. 217-238.

<sup>②</sup>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234.

<sup>③</sup> 李志永：《内外联动与自主性外交理论的探索》，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8期，第75页。

<sup>④</sup> [美] 肯尼恩·华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62-263页。

<sup>⑤</sup> 李志永著：《自主性外交理论：内外联动时代的外交行为与外交战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016年，第187页。

卷入全球体系中，从被殖民到成为跨国公司扩张的对象，拉美国家在“什么是国际体系中的自主性”问题上的思考和探索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先走了一步。自从19世纪拉美国家相继独立以来，实现政治和经济自主性就成为拉美地区的一个历史目标。<sup>①</sup>智利前外交部长慕诺兹（Heraldo Muñoz）认为，在所有拉美本土国际关系理论中，有三个反复出现的主题：一是实现国家和地区最大限度的自主性；二是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三是美国对拉美地区的强大影响力。其中，自主性问题是核心，因为它与其他两个主题密切联系。<sup>②</sup>如此，在一定意义上讲，拉美的经济自主性和政治自主性密不可分，拉美地区每一个经济政策问题都呈现高度政治化的特征。

围绕“自主性”命题，拉美形成了强大的地区学术共同体，甚至组成了具有拉美特色的“自主性学派”<sup>③</sup>。他们以国际体系中的外围弱国为视角，成为拉美国际关系学界理论化程度最高的流派。自主性学派最早可以追溯到依附论学者如奥唐奈（Guillermo O’Donnell）和林克（Delfina Linck）。巴西的雅瓜里贝（Helio Jaguaribe）、阿根廷的普伊格（Carlos Puig）的学说则直接以“自主性理论”冠名，随后卡洛斯·埃斯库德（Carlos Escudé）、胡安·加夫列尔·托卡特廉（Juan Gabriel Tokatlian）和罗伯托·罗素（Roberto Russell）等学者在总结和批判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与前人迥异的具有时代特征的“自主性”理论假设<sup>④</sup>。同时，他们还通过“旋转门”机制，担任外交部长、科技部长等职，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拉美国家的外交理念和行为。因此，他们的著作作为我们研究外围国家追求自主性的理论逻辑和实践提供了肥沃的学术土壤。本文以拉美“自主性学派”代表人物为例，探讨外围国家追求自主性的行为模式，试图建立外围国家外交行为的理论分析框架。

<sup>①</sup> Helio Jaguaribe, et al., *La Dependencia Político-Económica de América Latina*, Buenos Aires: CLACSO, 2017, p. 19.

<sup>②</sup> Heraldo Muñoz, “The Dominant Themes in the Study of Latin America’s Foreign Relations”, in *World Affairs*, Vol. 150, No. 2, 1987, pp. 129 – 146.

<sup>③</sup> 参见 Briceño Ruiz, Alejandro Simonoff, “La Escuela de la Autonomía, América Latina y la Teoría de las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en *Estudios Internacionales (Santiago)*, Vol. 49, No. 186, 2017, pp. 39 – 89.

<sup>④</sup> 自主性学派的学者大多是阿根廷和巴西学者。在智利、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也有相当多的学者研究“自主性”概念的内涵。由于阿根廷和巴西离美国的距离较远，受美国的影响在所有拉美国家中最弱，而且阿根廷和巴西在某些历史时刻自认为具有能够对抗美国霸权的相对能力，因此他们在享有基本主权的前提下，提出增加国家自主性策略。自主性概念在墨西哥、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国家的影响力较小，这是由于这些国家受美国直接干涉和领土侵略更严重，主权或不干涉主义是他们更大的诉求。参见 Juan Gabriel Tokatlian y Roberto Russell, “De la Autonomía Antagónica a la Autonomía Relacional: Una Mirada Teórica desde el Cono Sur”, en *Perfiles Latinoamericanos*, Vol. 10, No. 21, 2002, p. 168.

## 一 对抗型自主性

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以来，各地区不同的国际行为体逐步被囊括进一个全球民族国家体系。直至 20 世纪中叶，国家间的经济社会联系和互动仍然是遵循典型的现实主义理论的“台球模式”，各国相互撞击而缺乏有机联系，对抗是国际关系的主要特征。<sup>①</sup> 20 世纪 60 年代，在拉丁美洲兴起的依附论就是一种对抗性的理论，其理论意义在于将拉丁美洲的落后归咎于中心—外围的体系结构，以此为基础给出了如何超越依附、获得自主性的政策方案。

依附论借用 20 世纪 50 年代阿根廷学者普雷维什提出的中心—外围结构作为核心框架，从经济和贸易领域向政治和外交领域延展。依附论内部可以分成三个流派：新马克思主义流派（也称脱钩派）、结构主义流派和联合国拉美经委会内部的批判流派。<sup>②</sup> 其中，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在拉美颇有追随者。巴西的多斯桑托斯（Theotonio Dos Santos）、马里尼（Ruy Mauro Marini），阿根廷学者奥唐奈（Guillermo O’Donell）都属于新马克思主义流派。他们的主要观点是：在以资本主义体系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中，之所以存在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都是由中心—外围结构决定的。在这个不平等的结构中，外围国家处于劣势地位，霸权国家（当时的美国和前苏联）以及非国家行为者（如跨国公司、市民社会）制定或强加国际规则，使其资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积累。这些规则在国际组织和多边组织的规范建构过程中得以具体化。而拉美国家的精英和国家官僚机构与中心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如跨国公司）结盟而获得暂时的收益，这种利益使得外围国家的精英和国家官僚机构反对结构性改革，从而更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心国家的经济依附。在政治上，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者极力反对原料生产国的工业化和一体化进程，对不发达国家任何具有经济独立倾向的政府施加外交压力甚至政治颠覆，对任何可能威胁资本主义制度的人民革命运动实行镇压，使外围国家丧失政治体制上的自主性。因此，拉美的“不发达”不是先于资本主义的一个落后阶段，而是资本主义

<sup>①</sup> 李志永：《内外联动与自主性外交理论的探索》，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 年第 8 期，第 58 页。

<sup>②</sup> Cristóbal Kay, “Estructuralismo y Teoría de la Dependencia en el Período Neoliberal: Una Perspectiva Latinoamericana”, en *Nueva Sociedad*, No. 158, 1998, p. 103.

的后果，即依附性的资本主义。<sup>①</sup> 阿根廷学者奥唐奈和林克指出：“外围国家被中心国家支配是由于依附性的资本主义制度。”<sup>②</sup> 巴西学者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早年一直秉持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强硬立场，认为正是资本主义使欠发达地区对发达地区产生经济依赖并成为政治附属者。<sup>③</sup>

在这样不利于外围国家的结构体系和制度中，外围国家如何增加自主性、改变依附的局面？在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学者看来，在以中心—外围体系为基本结构的结构主义理论中，弱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不是一条通往繁荣之路，而是通往依附和不发达之路；融入以不对称为本质特点的世界体系并不能帮助外围国家产生自主性，只会加剧其依附性，因为“相互依存”“国家利益的和谐”“一体化”从来都是霸权国的借口。<sup>④</sup> 因此，外围国家要获得自主性，只能与以资本主义为基本特征的世界体系脱钩。具体来说，首先，外围国家必须脱离与西方中心国家的联系，以摆脱外部剥削与掠夺。<sup>⑤</sup> 其次，拉美应该采取内向型的集体自力更生式的地区主义合作，体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地区保护主义。如安第斯集团就提出，通过一体化建立一支与霸权主义抗衡的力量，不仅能够控制和引导外国投资、跨国公司的活动以及外国技术转让，实现经济自主发展，而且还能够保障国家主权、独立和自主，维护参与一体化国家的利益。<sup>⑥</sup> 因此，依附论学者所倡导的一体化是一种“排外的一体化”。最后，为赢得发展空间，拉美国家还必须突破中心国家对外围国家实施“统治”的框架制度。既然资本主义导致了外围不发达国家的依附性，那么拉美地区必须进行社会革命，彻底改变使之产生依附性的资本主义制度，打破转移剩余价值的依附链条，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

因此，从理论上讲，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对于拉美地区的发展持极端悲

<sup>①</sup> Theotonio Dos Santos, “The Structure of Dependence”, i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60, No. 2, 1970, pp. 231–236.

<sup>②</sup> Guillermo O’Donell y Delfina Linck, *Dependencia y Autonomía*, Buenos Aires: Amorrortu Editores, 1973, p. 12.

<sup>③</sup> Alejandro Simonoff (ed.), *Pensadores del Cono Sur. Los Aportes de Jaguaribe, Methol Ferré, Puig y Tomassini a las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Ciudad de la Plata: Universidad de la Plata, 2014, p. 9. 卡多佐到20世纪80年代逐渐转向温和派，认同依附论中的结构主义流派，认为外围国家依附性的资本主义发展依然是有可能的。

<sup>④</sup> Guillermo O’Donell y Delfina Linck, *Dependencia y Autonomía*, Buenos Aires: Amorrortu Editores, 1973, p. 80.

<sup>⑤</sup> 林红：《依附论的理论解构及其历史命运》，载《贵州社会科学》，2011年第9期，第17页。

<sup>⑥</sup> 马缨：《影响拉美区域主义发展的因素及区域主义的特点》，载《拉丁美洲研究》，2001年第3期，第36页。

观的态度。外围国家的自主性可以被称为“对抗型自主性”或“革命型自主性”，即只有与中心国家进行对抗，在国内进行社会革命，才能获得自主性。

## 二 外围自主性

二战结束后，美苏冷战爆发。美国长期视拉美为其经济“后院”和延伸的政治边疆，在拉美国际关系学者看来，美国的拉美政策贯彻了赤裸裸的现实主义权力政治学。因此，冷战时期拉美的国际关系研究不可避免地打上了现实主义的烙印，目的在于解决在东西方对抗的国际体系中外围不发达国家如何自处的问题。巴西高等研究所（Advanced Institute of Brazilian Studies）政治系主任、前科技部长雅瓜里贝（Helio Jaguaribe）部分继承了依附论的观点，但同时也批判了依附论的极端性。

受到依附论学者的影响，雅瓜里贝也从结构主义的视角分析冷战时期国际体系的特征。他将“中心—外围”国际体系分成更细的四个等级制层次：第一层次是世界霸权国家，是幅员辽阔并拥有核武器的发达国家，如美国和苏联；第二层次是区域性大国，雅瓜里贝当时预言中国会在20~30年之后成为区域大国；第三层次是具有自主性的国家，如西欧国家、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第四层次是不具备自主性的依附性国家，如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同时，雅瓜里贝在文中大量使用了依附论学派的话语，将外围国家的发展模式分成“交易式自主发展”“革命式自主发展”“依附性发展”“卫星式发展”“卖国贼式依附”和“强制性依附”等。<sup>①</sup>

在这样的体系结构中，雅瓜里贝认为，拉美国家的未来有三条道路：第一条是维持现状、继续依附，这条道路是资产阶级所希望的；第二条是革命，是激进的知识分子、大学青年和工会部门所希望的；第三条是自主发展，受到进步中产阶级、一些民族资产阶级、温和知识分子和批判革命的一些工会部门的青睐。<sup>②</sup>这是雅瓜里贝与依附论的分歧点：他并不认为革命是达成自主发展的唯一道路，相反，革命与自主发展是两条不同的道路。他既批判了依附之路，也批判了革命道路，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在拉美不可能实现，古巴

<sup>①②</sup> Helio Jaguaribe, et al., *La Dependencia Político-Económica de América Latina*, Buenos Aires: CLACSO, 2017, p. 45, p. 78.

革命也不可能在拉美第二个国家出现。<sup>①</sup>那么,何为自主发展的道路?雅瓜里贝在定义“自主性”的概念时,强调了国内和国际两方面条件的融合——自主性是在国内事务中自主决策的空间以及在国际事务中独立行事的能力。<sup>②</sup>自主性取决于“国内的可行性”(national viability)和“国际的可允性”(international permissibility)这两个结构条件。<sup>③</sup>“国内的可行性”指一国拥有足够的人力和自然资源、国际交流能力以及社会文化凝聚力,其中,社会文化凝聚力尤其重要,是国内可行性的基本要素。“国际的可允性”指的是一国根据其地缘政治和外交局面,应对国际威胁的能力。当外围国家政府观察到国际上的一些可允许空间,便可以规避霸权国的影响,采取与霸权国不同的政策。外围国家要获得自主性,除了必须满足上述结构性条件之外,还必须达到两个功能性条件:一是国内的科技和企业已经获得了令人满意的自主性;二是在与中心霸权国的关系中具有有利条件,特别是在种族—文化领域是一致的。<sup>④</sup>

鉴于拉美国家目前的国内可行性和国际可允性,雅瓜里贝乐观地认为,拉美地区可以采取更为温和但更有效的措施,即“外围自主性”,采取民族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和发展社会主义(socialismo desarrollista)政治体制<sup>⑤</sup>,从而走出外围地带。这种“折中”的政治制度选择决定了雅瓜里贝在国际关系领域选择中立原则。雅瓜里贝指出:“在我们的国际关系层面,政治民族主义倾向于在美国和苏联冲突中采取中立主义路线,这才符合民众利益和国家主权的要求。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冲突是无利可图的,因为发展中国家的主要问题是国内问题,它们干涉外部事务的能力是很有限的,而且它们干涉外部事务会导致国外势力对其国内事务的干涉,这是得不偿失的。”<sup>⑥</sup>因此,外围自主性倡导的是:在霸权国争夺全球霸权或区域霸权时,国际体系中的小国采取孤立和防御性姿态,或者采取中立的立场,避免与竞争国接触,而不

<sup>①</sup> Helio Jaguaribe, et al., *La Dependencia Político-Económica de América Latina*, Buenos Aires: CLACSO, 2017, p. 163.

<sup>②③</sup> Helio Jaguaribe, “Autonomía Periférica y Hegemonía Céntrica”, en *Estudios Internacionales*, Vol. 12, No. 46, 1979, pp. 96-97, pp. 91-130.

<sup>④</sup> Helio Jaguaribe, *Desarrollo Económico y Político*, México: 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 1973, p. 128.

<sup>⑤</sup> Helio Jaguaribe, et al., *La Dependencia Político-Económica de América Latina*, Buenos Aires: CLACSO, 2017, p. 72.

<sup>⑥</sup> Helio Jaguaribe, *O Nacionalismo na Atualidade Brasileira*, Rio de Janeiro: Ministério da Educação e Cultura, Instituto Superior de Estudos Brasileiros, 1958, pp. 249-250.

是采取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倡导的革命性和对抗性姿态，这样有利于增强外围国家的自主性。

### 三 非正统自主性

20世纪80年代初，阿根廷学者、前外交部长普伊格（Juan Carlos Puig）在雅瓜里贝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自主性理论。普伊格同样使用结构主义分析方法，认为国际体系就如同任何一个微观或宏观的人类社会，各国有不同的分工。根据其分工的不同，可以分成三类行为体：一是最高分配者，他们制定分配政策并监督政策的实施；二是较低级的分配者，他们负责执行最高分配者的决议，三是接受者，即服从者。<sup>①</sup>可见，国际体系是以“最高分配者—较低级分配者—接受者”这样的等级制为基本特征的。

在此基础上，普伊格赞同雅瓜里贝提出的“可行性”概念，认为外围国家只有在实现更大的国内可行性的条件下，才能实现从依附向自主的过渡。他指出，这种过渡并不是立即实现的，而是逐步实现的。外围国家的渐进式“自主化”战略必须经历四个阶段：准殖民地式依附（*Dependencia Para - Colonial*）、国家依附（*Dependencia Nacional*）、非正统自主性（*Autonomía Heterodoxa*）和分离式自主性（*Autonomía Secesionista*）。<sup>②</sup>

准殖民地式依附指虽然国家拥有主权，但是该国精英在政治、经济甚至意识形态上依附于中心国家。在这种依附模式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方向依附于中心国家的利益：自然资源采掘业大力发展，而初露头角的制造业受到国外竞争的打击；中心国家在外围国家获得的经济利益被转移到国外，而不是继续投资于外围国家来促进外围国家的国内经济自主发展。

国家依附指的是外围国家理性地接受依附中心国家的现状，但是拥有自主发展战略，试图从依附状态中获取自己的利益。同时，外围国家确立“底线”以限制中心国家的影响，如果中心国家试图僭越它们的底线，外围国家就会奋起反抗。

非正统自主性的自主程度强于国家依附。在非正统自主性中，外围国家

<sup>①</sup> Juan Carlos Puig, *América Latina: Políticas Exteriores Comparadas*, Buenos Aires: Grupo Editor Latinoamericano, 1984, pp. 49 - 54.

<sup>②</sup> Juan Carlos Puig, *Doctrinas Internacionales y Autonomía Latinoamericana*, Caracas: Universidad Simón Bolívar, Instituto de Altos Estudios de América Latina, 1980, pp. 149 - 155.

不接受霸权国家以“阵营”的名义，教条地将体现霸权国自身利益的政策和战略强加给外围国家。<sup>①</sup>在霸权国核心战略利益的问题上，外围国家与中心国家的期望保持一致。这里的核心战略利益指霸权国不惜使用一切资源，包括武力，也要保证外围国家服从霸权国利益的事项，即该事项不是一般利益，而是关于生存的利益。在非核心战略利益问题上，外围国家与霸权国之间的分歧可以有序地存在。对于外围国家来说，非正统自主性就是理性地、准确地判断什么时刻一般利益会变成关乎生存的利益<sup>②</sup>，从而最大限度地利用中心国家的弱点和错误，扩大可操纵的空间。

分离式自主性是最高程度的自主性，指外围国家完全切断与霸权国家之间的纽带，这种自主性的成本是最高的。普伊格认为，在权力不对称的国际社会中，分离式自主性是充满风险的。如果一个外围国家没有足够的能力或者操作不当，它就会耗尽国家资源，导致适得其反的结果，从而使得国家不可避免地重新陷入依附的状态。国家依附和非正统自主性是拉美国家的常态。<sup>③</sup>

普伊格的自主性理论与依附论倡导的“自主性是一种绝对的对抗者的身份”有本质区别。外围国家的非正统自主性并不追求完全的行动自由，而是在一定限度内的自主性，即自主性是“一国考虑到真实世界的客观条件，所拥有的自我决策的最大能力”<sup>④</sup>。目前的国际体系仍然存在空间可供拉美国家利用。垂直的分工体系并没有剥夺外围国家自主行事的所有可能性，相反，外围国家还是有可能改变现有体系，或者创造新的结构，从而限制更强大的中心国家。霸权国家默许拉美国家拥有有限的自主空间，来确保拉美国家在核心利益上与霸权国保持一致。同时，面对霸权国，外围国家应该灵活地、平衡地利用有形和无形的权力资源，采取渐进的方式而不是正面对抗，在霸权国非核心利益的领域拥有自主发展战略，普伊格称之为“战略性操控”<sup>⑤</sup>。

非正统自主性的概念虽然只是一个抽象的框架性概念，但对于外围国家

<sup>①</sup> Juan Carlos Puig, *América Latina: Políticas Exteriores Comparadas*, Buenos Aires: Grupo Editor Latinoamericano, 1984, p. 78.

<sup>②</sup> Juan Carlos Puig, *Doctrinas Internacionales y Autonomía Latinoamericana*, Caracas: Universidad Simón Bolívar, Instituto de Altos Estudios de América Latina, 1980, p. 152.

<sup>③</sup> Juan Carlos Puig, *América Latina: Políticas Exteriores Comparadas*, Buenos Aires: Grupo Editor Latinoamericano, 1984, pp. 78 - 79.

<sup>④</sup> Juan Carlos Puig, *Doctrinas Internacionales y Autonomía Latinoamericana*, Caracas: Universidad Simón Bolívar, Instituto de Altos Estudios de América Latina, 1980, p. 148.

<sup>⑤</sup> Juan Carlos Puig, *América Latina: Políticas Exteriores Comparadas*, Buenos Aires: Grupo Editor Latinoamericano, 1984, p. 49.

扩大思想和行为的空间很具有启发性。<sup>①</sup> 智利学者伯纳尔—梅萨（Bernal—Meza）认为，非正统自主性实际上就是“第三条道路”。对阿根廷来说这意味着，在冷战时期，阿根廷将在涉及与苏联发生冲突的重要问题上支持美国，但会根据国家发展的需求重新考虑发展与欧洲和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的关系。<sup>②</sup>

普伊格的自主性理论在两个方面有重大突破。第一，分析对外政策时“去意识形态化”，更加理性地看待外围国家在追求自主性的过程中面临的限制因素和机会，在与中心国家保持核心利益一致的前提下，战略性地操纵国际体系，从而获得更大的自主性；第二，不过分夸大外围国家依附性的“顽疾”，不怨天尤人，也不激进地革命，这在政治上可以定义为“改良派”。

#### 四 投资型自主性

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占绝对主导地位的霸权国家。福山称这个时代是“历史的终结”。苏联的解体使得美国不用再担心拉美这个“后院”是否会倒向对手，因此，拉美国家对于美国的战略地位大大降低。在经济上，拉美国家普遍深陷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缺少经济资源来发展战略性规划，不得不求助当时美国主导下的国际金融组织的援助。外围国家如何在单极世界里获得发展，成为拉美自主性学派急需解决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拉美学界出现了以阿根廷学者卡洛斯·埃斯库德为主导人物的外围现实主义理论。

埃斯库德的理论基于他扎实的历史经验。他首先回顾了阿根廷与美国的关系史，认为阿根廷反美政策的强度在拉美国家中是数一数二的，这是由于阿根廷的经济增长使其滋生了成为大国的期望，阿根廷在地缘上的孤立以及其文化教育体系都培养了该国骄傲自大的态度。阿根廷受到地缘政治理论、西方现实主义理论和依附论等理论的影响，这些理论对阿根廷领导人外交思想的形成具有塑造反美意识形态的功能。然而20世纪八九十年代阿根廷爆发

<sup>①</sup> Mario Rapoport, “Problemas y Etapas en la Historia de las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de la Argentina”, en *Historiografía Argentina (1958–1988). Una Evaluación Crítica de la Producción Histórica Argentina*, Buenos Aires: CICH-CA (Comité Internacional de Ciencias Históricas Comité Argentino), 1990, p. 565.

<sup>②</sup> Raúl Bernal—Meza, *América Latina en la Economía Política Mundial*, Buenos Aires: Grupo Editor Latinoamericano, 1994, pp. 170–173.

的金融危机，显示阿根廷为其长期奉行的权力导向和意识形态导向的外交政策付出了高昂代价。<sup>①</sup> 在埃斯库德看来，这种以“尊严”“荣誉”“自尊”为中心的挑衅性语言只不过是“追求虚荣的邪恶的精英主义”。民族主义是阶级剥削的工具，因为它在底层人民中制造忠诚和狂热，通过意识形态来更容易地统治和控制底层阶级。<sup>②</sup>

依据阿根廷的反面案例，埃斯库德提出以下三个假设。

首先，埃斯库德反对华尔兹认为国际体系是无政府社会的假设，提出国际体系是一种不完善的等级制状态，即大国之间是无政府的，但大国和弱国之间是等级制的。这与依附论中的“中心—外围”等级制视角以及普伊格的国际社会等级划分是一脉相承的。

其次，埃斯库德批判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观，他提出弱国的国际关系应以经济发展和国民福祉为导向。埃斯库德认为，现实主义权力政治观的重要信条“没有权力的外交政策是不存在的”可能只适用于发达工业国家，它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世界上大多数小国从物质进步中获得的收益要比孤注一掷追求权力得到的收益大得多。<sup>③</sup> 弱国因其国家社会复合体偏好结构的不同，可能成为服从国或反叛国。而阿根廷的历史经验表明，当一个弱小国家以极大的自身代价去挑战一个强大国家时，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一段勇敢的史诗，而是精英们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牺牲穷人的利益、福利，甚至生命。他甚至提出这样一个等式：“完全的自由 = 绝对的国内独裁专政”。<sup>④</sup>

最后，为了谋求经济发展和增加公民福祉，外围国家应该接受与大国关系中的等级制，务实理性地看待他们缺乏绝对自主性这一事实，而不应该以自由的绝对程度来衡量自主性。外围国家应该抱以“小国侍大国”的外交政策哲学，与中心国家进行合作，尽可能地利用他们在世界政治中偶尔拥有的、从属程度较低的机会发挥自主性。

埃斯库德尤其注重外围国家的外交成本问题。“在像阿根廷这样的国家，国际关系理论往往是不加批判地被接纳，而且对它们的解读并不完全正确。由于

<sup>①</sup> Carlos Escudé, *Foreign Policy Theory in Menem's Argentina*,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1997, pp. 1-4.

<sup>②</sup> Carlos Escudé, "La Política Exterior de Menem y Su Sustento Teórico Implícito", en *América Latina Internacional*, Vol. 8, No. 27, 1991, p. 400.

<sup>③</sup> 孙若彦著：《独立以来拉美外交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60页。

<sup>④</sup> Carlos Escudé, "Realism in the Periphery", en Jorge I. Domínguez y Ana Covarrubias (eds.), *Routledge Handbook of Latin America in the Worl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p. 47.

错误的解读，导致国家政府采取的政策出现了严重的自我毁灭性错误。例如，西方的理想主义理论家只关注美国或其他中心国家对挑衅它们的第三世界国家实施经济或军事制裁的成本，而往往不关注这些挑衅对于阿根廷所意味的成本，似乎成本问题对美国而言非常重要，但对我们（外围国家）来说并不重要。而实际上，中心国家可以承受比我们更高的成本。”<sup>①</sup> 基于此，对于弱国来说，为了得到更高的成本—收益比，自主性不应该是外交政策的目的，而是用来交换更大收益的工具。为此，埃斯库德提出“投资型自主性”的概念：每个国家都有基本的自主性，他们可以有两种利用自主性的方式，一种是消费型自主性，一种是投资型自主性。<sup>②</sup> 弱国不能“挥霍”自主性来满足其国家精英的欲望，也不能在一些象征性、对抗性、挑衅性的态度中“浪费”自主性，而应该“投资”自主性，从而增加国家权力和国民福利。外围国家应该限制与大国在经济方面的对抗，看清现实，谨慎实施外交政策，从而减少中长期的成本和风险。<sup>③</sup>

投资型自主性并不意味着完全放弃自主性、回归依附状态，因此，拉美学界更倾向于将外围现实主义看成是拉美对自主性概念辩论的一种延续，而不是断裂。<sup>④</sup> 埃斯库德认为外围国家反抗中心国家意味着巨大成本，是注定会失败的，因此他倡导牺牲一部分自主性来换取中心国家给予的利益，这引起了不少学者对于拉美加深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依附的担忧。事实证明，遵照美国的指示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并没有让拉美国家走上稳定发展的道路。2001年阿根廷爆发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并没有施以援手，这也引发了以投资型自主性为信条的外围国家是否会得到中心国家等比例回报的质疑。

## 五 关系型自主性

21世纪以来，遵照美国药方实施的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失败之后，倡导亲

<sup>①</sup> Carlos Escudé, *Realismo Periférico: Fundamentos para la Nueva Política Exterior Argentina*, Buenos Aires: Planeta, 1992, p. 17.

<sup>②</sup> Carlos Escudé, *El Realismo de los Estados Débiles. La Política Exterior del Primer Gobierno de Menem Frente a la Teoría de las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Buenos Aires: Grupo Editor Latinoamericano, 1995, p. 221.

<sup>③</sup> Carlos Escudé, *Realismo Periférico: Fundamentos para la Nueva Política Exterior Argentina*, Buenos Aires: Planeta, 1992, p. 122.

<sup>④</sup> Alejandro Simonoff, “La Interpretación del Pasado como Eje de la Disputa de la Política Exterior Actual: de Puig a Escudé”. [http://historiapolitica.com/datos/biblioteca/expertos\\_simonoff.pdf](http://historiapolitica.com/datos/biblioteca/expertos_simonoff.pdf). [2019-02-01]

近霸权国家的外围现实主义理论也逐渐淡出拉美舞台。“9·11事件”之后，美国对外政策重心发生偏移，美国对拉美政策的忽视给拉美国家的内外决策提供了更大的自主空间。以相互依赖为主要特点的多极化世界对于霸权国家来说意味着自主性的降低，因为霸权国家采取单边主义行动的制约因素大大增加；对于外围国家来说却恰恰相反，因为相互依赖关系织成的“关系网”能够给外围国家提供更大的自主性。阿根廷学者胡安·加夫列尔·托卡特廉和罗伯托·罗素在回顾了普伊格的自主性理论和埃斯库德的外围现实主义理论提出的历史阶段特征和内涵之后，提出这些传统的自主性概念不能帮助拉美人民理解自主性在当下的含义，也不能成为指导拉美国家外交政策的指南<sup>①</sup>。全球化、后冷战时期、拉美一体化和民主化进程已经改变了拉美国家的国际行为背景。在这四个新的时代背景变量下，必须重新定义自主性，因此，他们提出了“关系型自主性”（*autonomía relacional*）的概念。

为了重新定义“自主性”这个概念，托卡特廉和罗素认为，首先应该把自主性与主权的概念区别开来。自主性是一个严格的政治概念，具有意愿属性；而主权则是法律上的概念。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相互依赖理论的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指出，“跨国关系的影响使得国家在控制各种问题的愿望和实现这一愿望的能力之间造成了巨大的鸿沟。问题不在于国家是否丧失法律上的主权，而在于丧失政治和经济自主性。因此，主权是在逻辑上先于自主性的基本权利，而自主性则是国家的一种可变属性，是所有国家外交政策的基本的、永久的目的。”<sup>②</sup>

在此基础上，托卡特廉和罗素提出，自主性的概念并不是一国在做决策时不追随别国意愿或命令的能力，而是“一国出于自己的意志，与其他国家一起做决策，共同应对境内外发生的状况的能力和意愿”。<sup>③</sup>对自主性的捍卫并不能来自依附论所倡导的孤立、自给自足或反对国际体系的国内政策或次区域政策。为捍卫国家的自主性，拉美国家应该积极与其他国家合作，参与并有效地影响世界事务，特别是在国际组织和制度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具体地说，关系型自主性包括以下六个关键论点。其一，自主性存在于

<sup>①</sup> Roberto Russell y Juan Gabriel Tokatlián, *Autonomía y Neutralidad en la Globalización. Una Readaptación Contemporánea*, Buenos Aires: Capital Intelectual, 2010, pp. 13 - 14.

<sup>②③</sup> Juan Gabriel Tokatlian y Roberto Russell, “De la Autonomía Antagónica a la Autonomía Relacional: Una Mirada Teórica desde el Cono Sur”, en *Perfiles Latinoamericanos*, Vol. 10, No. 21, 2002, p. 166, p. 176.

关系网络中，而不是孤立地存在，甚至可以说，“他者”已经成为行动整体的一部分而不是对立面。其二，在关系网络中，自主性与依附性相生相得，不再是两个对立的极端。其三，关系型自主性强调合作而不是对抗，即自主性是通过嵌入、合作而不是对抗来获得和增加的。其四，关系型自主性强调国家必须负责任地行动。关系型自主性要求增加国家间的互动、协商、合作，要求积极参与全球治理问题的国际制度与规范制定。国家对自主性的维护是通过合作和承担国际责任来实现的。其五，关系型自主性不应该只适用于政府的外交政策，非政府行为体也应该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其六，关系型自主性并不是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之间完全平等的理想主义理论。托卡特廉和罗素承认现实主义理论倡导的权力政治、支配和从属状况仍然存在，但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积极建构国际新秩序、实施关系型自主性成为减少权力不对称的一种有效战略。

拉美国家如何实现“关系型自主性”？托卡特廉和罗素辩证地提出，实施关系型自主性的第一环是南美国家之间的关系，而将关系型自主性运用到南美国家之外则取决于两个相互依存的因素：一是无政府国际社会的主流文化是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还是康德文化；二是美国对拉美的政策，美国是否愿意牺牲自己的行动自由来换取其在国际事务中的声望和领导力。南美国家外交政策的自主性程度不应该由与美国对立的程度来衡量。一国自主决定的政策有可能与美国的政策是高度一致的，因此，并不是与美国政策的对立性决定自主性，一国自身决定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政策的能力才是决定自主性的关键。<sup>①</sup>

托卡特廉和罗素并没有像依附论学者、雅瓜里贝或普伊格那样以不对称的中心—外围等级制为出发点，而是认为全球化所带来的多极世界是中性的，多边主义能够限制中心国家美国的单边主义，从而增加外围弱国自主行动的空间。早在1998年，托卡特廉就已提出了关系型自主性的“整体主义”倾向。他将全球化作为重要的时代背景，认为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国外现象的内部化以及国内事务的国际化”。<sup>②</sup>可见，关系型自主性的概念受到建构主义

<sup>①</sup> Juan Gabriel Tokatlian y Roberto Russell, “De la Autonomía Antagónica a la Autonomía Relacional: Una Mirada Teórica desde el Cono Sur”, en *Perfiles Latinoamericanos*, Vol. 10, No. 21, 2002, pp. 181 - 182.

<sup>②</sup> Juan Gabriel Tokatlian, “¿Hacia una Redefinición de la Autonomía? Pos Guerra Fría, Política Exterior e Inserción Internacional”, en C. Nasi (comp.), *Post Modernismo y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Bogotá: Pontificia Universidad Javeriana, Universidad de los Andes,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Colombia, Ediciones Uniandes, 1998, p. 190.

理论的影响。国家间的合作是一个社会化过程，具有约束力的行为规范通过内部化过程影响国家的行为。弱国通过参与国际机制也能够重塑中心国家的观念。如果国家互动能够基于新的制度结构和新的身份和观念体系，那么，国家之间发生的是融合而不是对立，弱国就能实现嵌于关系中的自主性。

因此，关系型自主性与依附论中的对抗型自主性是截然相反的，后者倡导通过物理性孤立和集体自力更生来对抗中心国家。关系型自主性与普伊格的“一国扩大决策空间必然意味着减小另一国的空间”的零和观点也是背道而驰的。关系型自主性概念提出后便受到拉美国家尤其是巴西的青睐。一些拉美国家积极参与新的国际机制，但同时与中心国家保持良好互动，通过体系来减少权力的不对称，增加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自主性。

## 六 结语：外围国家的自主性模式

拉美学者无不承认拉美国家作为外围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脆弱性，但他们并没有放弃对自主性的追求。因此，拉美自主性学派为我们建立起外围国家追求自主性的行为模式分析框架提供了绝好的案例。

依附论产生的背景是20世纪50年代批判现代化理论的浪潮、民族解放运动和反对殖民主义运动兴起，因此，它所倡导的自主性是一种对抗性的概念，认为外围国家必须发动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割裂与资本主义制度主导的国际体系的一切联系，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从而达到绝对的自主。有学者认为这一理论“不愿意理解社会进化的意义，不愿意认真地、一步一步地改革现状，而是希望一下子彻底地解决问题，倾向于提出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方案。”<sup>①</sup> 尽管如此，这种对抗性的自主性和集体自力更生的主张仍然在拉美地区留下了巨大的政治遗产。它将自主性与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起到了促成拉美左翼意识形态“联合阵线”的作用。从依附论的提出开始，隔断与资本主义的联系、进行激进的社会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及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就成为拉美左翼社会力量的美好愿景，目的是达到绝对自主性，实施内向的发展战略，在国际体系中从政策的接受者转变为政策的主动制定者。

雅瓜里贝和普伊格提出外围自主性和非正统自主性的时代背景是冷战时期世界格局的两极化，为了不卷入美苏对抗的冲突中，雅瓜里贝提出外围国

<sup>①</sup> 尹保云著：《什么是现代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47页。

家应该在国际关系中保持消极的中立。普伊格则提出，拉美应该在战略问题上与美国保持一致，但尽可能地利用两个中心大国留下的空间，减少对中心国家的从属和依附，在霸权国非核心利益的领域拥有自主发展战略，寻求平衡、灵活的自主发展，并抓住稀缺的机会开展战略性操纵，以获得更大受益。外围自主性和非正统自主性即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在政治上可以定义为“改良派”。

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世界格局暂时出现美国一超独霸的局面，冷战时期的非正统自主性概念受到外围现实主义代表人物埃斯库德的批判。埃斯库德从相对成本的角度去解释自主性，认为外围国家应该仔细权衡外交政策的成本—收益比，而不应该追求完全的行动自由。它们应该以自主性作为工具，追随中心国家，以便获取中心国家给予的经济援助或者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然而，外围国家是否会得到中心国家等比例的回报是值得怀疑的。

21世纪以来，国际环境再次发生深刻变化，中心国家（美国）倡导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在拉美遭遇失败，同时，多极化成为国际社会的最大特征。在关系型自主性的倡导者看来，多极化的效应是中性的。外围国家应该利用全球化带来的相互依赖关系，织成一张巨大的关系网，相互牵制，相互利用，以便获得更大的决策空间。此时，自主性存在于多样化的合作和对国际社会的积极融入，因此，关系型自主性倡导“联合自强”的外向策略。

事实上，以上时代因素同时存在于当今复杂的国际社会：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和讨论方兴未艾；中心—外围结构持续存在，南北国家之间分野加剧；中美贸易战或将演变成中美两国的长期对抗，导致一种新的“冷战”格局；尽管国际体系多极化发展的趋势不可逆转，美国对于一些外围国家（尤其是拉美国家）来说仍然是不可逾越的区域霸权国，美国霸权的历史惯性和影响仍然存在，一些外围国家依附于美国的路径依赖现象也依然存在。因此，拉美自主性学派的观点不但没有过时，而且具有重大的前瞻性。在当今复杂的国际社会，上述五种外围国家的自主性模式定会同时成为不同外围国家的对外政策。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以拉美国家为典型的外围国家会选择哪种自主性模式值得进一步关注。本文探讨的自主性模式或能够成为分析外围国家对外政策的初步分析框架。

（责任编辑 黄念）